

本文作者李家焯,离休前任上海市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曾负责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生前的后勤保障管理工作。

长久以来,国家领导人的收入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作为国家名誉主席的宋庆龄自然也不例外。比如宋庆龄每月的收入有多少,大约都有一些什么开支,是否还有额外的收入,留下了多少遗产等等。为此,李家焯特撰写此文,以对宋庆龄当时的经济状况加以说明。



晚年的宋庆龄生活并不富裕 资料图片

# 我所经手的宋庆龄晚年的五笔钱

新中国成立以后,宋庆龄于1959年4月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她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工资以及一些稿费。当时宋庆龄是国家行政一级工资,每月579.5元,同时,考虑到她的外事活动比较多,国家另外每月还给她300元活动费。“文化大革命”期间,宋庆龄主动将每月的活动费退还给国家。宋庆龄的工资除了用于自己的日常生活费用外,她还长年承担着两个保姆的工资以及曾经在宋庆龄身边工作过的警卫员隋学芳的两个女儿的抚养费用。至于宋庆龄额外的稿费收入,大部分都捐献给了中国妇女和儿童的慈善事业。所以,宋庆龄并不富裕,而且还时常经济拮据。

在宋庆龄生命最后的几年里,我作为宋庆龄身边的管理工作人员,经手了宋庆龄的五笔钱。

## 第一笔:组织上给宋庆龄1万元生活补助费

1978年12月30日,宋庆龄最后一次回到上海。因经济拮据,宋庆龄委托我帮助出卖了家中的一些物品。当我找来旧货商店的人来对所卖的物品进行估价,结果才值2000多元,她颇为失望。杜述周(时任宋庆龄的警卫秘书)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向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反映了宋庆龄经济拮据的情况,组织上决定给宋庆龄生活补助费1万元。

1979年1月31日,杜述周回老家陪护母亲以后,由京赴沪,组织上让他顺便给宋庆龄带去那1万元现金的生活补助费。

宋庆龄因确需用钱才收下了这1万元钱。她回函给杜述周说:“一万元我收了,因我的确需用钱。卖掉的机器皮货等,不过收到我所希望的百分之二!因此,我只好收了,因等用款子。”杜述周在上海期间,告诉了我这1万元钱的情况。

宋庆龄逝世后,我在北京她家中整理物品的时候,看到了这笔尚未动用的1万元现金。后来,按照执行宋庆龄遗嘱“八人小组”的会议精神,北京方面的钱归北京管理,上海方面的钱归上海管理的原则,这一万元钱就留存在北京宋庆龄故居。

## 第二笔:国家财政补贴给宋庆龄5万元

得知宋庆龄经济拮据的情况后,1979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给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彭冲来信,决定从国家财政中拨款5万元人民币给宋庆龄。当时,彭冲叫我去他的办公室,当面交代我说,这5万元钱交给你去办理具体的手续。

在上海市财政局办好手续后,我立即向宋庆龄进行了汇报。宋庆龄说“谢谢”,并表示她

自己不管这笔钱,交由我来管理。她还特意交代:“如果以后需要用钱,我会写信给你,你凭信将钱交给来人就行了。”为了方便这笔钱的使用,宋庆龄还让我去刻一枚名为“林泰”(宋庆龄经常使用的一个别名)的印章。

随后,我把这笔5万元的拨款单交代上海市委办公厅行政处财务科以“林泰”的名义存进市委机关附近的银行。每次宋庆龄要用钱,总是派人带着她的亲笔信到上海来,由于平时我的工作比较忙,来人一般都是先找到沈粹缜(邹韬奋夫人,时任中国福利会秘书长),由沈粹缜打电话告诉我,我将钱准备好,约好时间,我送到沈粹缜家里再给来人。

一直到宋庆龄去世,这笔钱也没有用完,大约总共才花了1万多元。宋庆龄逝世后,这笔余下的钱转由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保管,并且再也没有动用过。

## 第三笔:中央决定给宋庆龄5万元慰问金

1981年5月14日晚,宋庆龄病危,情况危急。在接到杜述周打给我的电话以后,当晚深夜12点多钟,我就到宋庆龄家里去了。15日上午我在宋庆龄家里楼下小客厅休息,这时,中央派来的吴庆彤进来,他走到我身边,交给我一张5万元的支票,说:“这是中央给宋庆龄的慰问金。”我知道,按照宋庆龄的一贯做法,只有经过她的同意才能收下。但是,这时宋庆龄已经病危了,我就只好先代为收下这笔中央给宋庆龄的慰问金。

18日上午,根据安排,我上楼去看望宋庆龄。当时钟兴宝(宋庆龄的贴身保姆)用嘴贴在宋庆龄的耳边轻声说道:“首长,上海李局长专门来看望你了。”已经病危多日的宋庆龄这时竟然睁开了双眼,我向宋庆龄轻声地问候,并向她汇报:“中央派吴庆彤同志来看望你,并带来了5万元人民币慰问金。”她轻声说:“谢谢。”也没有再说什么的话。这笔钱就一直由我保管着,我也无法交给别人。

29日晚20点18分,宋庆龄逝世,当时我正在上海市委办公楼上,20点45分,总机急切地找我接北京来电,杜述周在电话里对我说:“首长已经过世。”经中央安排,我于30日上午赴京,参加宋庆龄的治丧活动。当日上午我在中办招待所再次见到吴庆彤同志,就把这笔5万元钱的支票交还给他,并代表宋庆龄感谢组织上的关心。

## 第四笔:巴金捐款5万元给宋庆龄基金会

宋庆龄逝世以后,在邓小平的倡导下,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宋庆龄基金会,并由邓小平亲自担任宋庆龄基金会名誉主席。

沈粹缜是宋庆龄基金会的理事成员,她在北京参加完宋庆龄基金会成立仪式,回到上海以后又去看望了巴金(原名李尧棠),当巴金得知成立宋庆龄基金会的情况以后,立即表示要捐款,他让女儿李小林开了一张5万元的支票。沈粹缜回到家后打电话给我,把巴金捐款一事告诉了我,并想请我代收此款转交给北京。正好过几天我要到北京出差,便答应下来。当我从沈粹缜家里拿到这张5万元支票的时候,看到支票上面的印章是李尧棠。

我到北京以后,住在北京饭店。我打电话给汪志敏(时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宋庆龄基金会秘书长),告诉他巴金要捐款给宋庆龄基金会的事情。汪志敏立刻到北京饭店我的住处看我,我又再次向他介绍了巴金捐款一事,并当面把5万元支票交给了他。汪志敏表示感谢巴金对宋庆龄基金会工作的支持,会正式出具收据寄给巴金。

## 第五笔:沈粹缜捐款5000元给上海宋庆龄基金会

众所周知,沈粹缜是宋庆龄生前的挚友。尤其是在宋庆龄晚年的时候,沈粹缜与宋庆龄来往频繁,亲如姐妹。

宋庆龄对沈粹缜在生活上一一直非常关心。1980年5月17日,宋庆龄致信沈粹缜,信中说:“我要交给您5000元留给你的钱,不要客气,当我是自己人。”当时沈粹缜回信给宋庆龄说,过去在解放前深得宋庆龄的照顾,解放以后自己有了工作,也有了收入,就不能接受宋庆龄的这5000元钱了,如有需要的话,她也绝不见外(宋庆龄与沈粹缜关于此事的来往信件我都保存有复印件)。如前文中所述,因为宋庆龄的5万元钱在我这里保管,沈粹缜便把宋庆龄的这封信交给我看,我也知晓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1981年6月,在执行宋庆龄遗嘱“八人小组”的第一次会议上,沈粹缜提起了宋庆龄曾经来信要给她5000元钱的事情。后来邓颖超指示,由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管理处从处理宋庆龄后事的钱中支付5000元钱给沈粹缜,并要我送给她。

9月29日,我和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管理处处长孙志远一起到沈粹缜家。我向沈粹缜说明了这5000元钱的情况。沈粹缜表示:“由李家焯同志到我家交给我5000元钱,我愧对庆龄同志的信任,不能接受这笔钱,我决定将这笔钱捐赠给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管理处。”

1986年5月,上海成立了宋庆龄基金会,沈粹缜又把这5000元钱改捐给上海宋庆龄基金会。

李家焯/文 摘编自《百年潮》

这是一群无名英雄,其经历与福尔摩斯一样充满传奇色彩。据说他们每年至少能挣几万甚至数十万元“正义赏金”。犯罪分子称其为“影子杀手”,对他们闻风丧胆。

这是一个极其隐秘的职业群体,他们依靠捉拿政府悬赏的犯罪分子获取奖金,既是执法部门的得力助手,也是令罪犯闻风丧胆的民间英雄。他们都是些什么人,为何要过这种“刀尖上跳舞”的生活?

# 揭秘中国“赏金猎人”

## 怀揣通缉令的平民“捕快”

刘剑涛是北方人,曾在部队侦察连服役,擅长擒拿格斗。1998年,他来到深圳,在一家集团公司当保安队长。一天晚上,同在深圳的妹妹在回家途中被两个歹徒砍成重伤。这件事深深刺痛了刘剑涛的心,想到飞车贼疯狂抢劫市民的新闻频频报端,愤怒之余他下定决心,要为自己深爱的城市做点什么!

起初,他以“兼职”的形式做“赏金猎人”,每天下班后,和几个志同道合的人一起驾着摩托车满城“巡逻”,遇到飞车党作案,他和“战友”就会奋不顾身地冲上去将对方制服,送到公安机关。每次见义勇为后,警方都会视案件大小,给予“赏金猎人”一定的奖金,这让他感觉简直比拿10倍的工资都有成就感,“我们这样做要冒很大风险的,收取点酬金也是一种动力。”

两年后,智勇兼备的刘剑涛开始不满足于对付飞车贼这种“小打小闹”,不久后,他辞掉工作,单枪匹马到偏远地区抓逃犯去!出门前,刘剑涛收集了厚厚一沓公安部门悬赏的逃犯通缉令,这些或侵占巨额公款、或身背数条命案的犯罪分子,就是他的“猎物”。

2004年冬天,刘剑涛踏上了去新疆的火车,并在当地一个农场打工。一天傍晚,农场里两帮外地民工打起了群架。其中一个操着四川口音的醉汉忽然抽出腰间的匕首吼道:“老子连人都杀过,还怕你们这帮龟儿子?”围观者悄悄拨打了110,不一会儿警察赶到现场,却发现那个扬言“杀过人”的吴某已不见踪影。

了解情况后,民警们开始四处追寻,刘剑涛也主动帮忙。经过一番搜寻,他终于在接近沙漠的地方发现一串新鲜脚印。追出大约半小时,脚印突然在一个土沙包旁消失了。不料,吴某从他身后一个高高的土包下“冒”了出来,手持匕首威胁道:“想送死就过来!”话音刚落,就向刘剑涛的左胸刺来,说时迟那时快,刘剑涛毫不畏惧,凭着过硬的功夫,一招“挟臂夺刀”抢过吴某的凶器,又一个扫荡腿迅速将其擒获。

民警将此人带回派出所后一调查,大吃一惊:吴某竟是公安部门悬赏5万元捉拿的B级通缉犯!因刘剑涛追捕逃犯有功,事后他得到了这笔悬赏奖金。

初战告捷,这位“赏金猎人”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几年来,他走南闯北,共向公安部门举报或直接押送了8名在逃犯,其中包括一个制造过灭门惨案的A级通缉犯!

## “百变侠女”成了毒贩克星

许俐今年28岁,老公曾是一家知名公司的销售精英,帅气而多金,对她十分宠爱。但结婚一年后,因交友不慎,他竟误入歧途成了吸毒者!为了吸毒,家里的东西全卖光了,他就开始在外面干违法勾当,直到因抢劫杀人被判处死刑。

痛失丈夫后,许俐恨透了那些丧尽天良的毒贩子。她发誓,一定要协助警方将贩毒者一网打尽!于是她找出老公平时频繁拨打的几个电话号码,提供给了公安局缉毒大队,并主动汇报她所知道的一切情况。不到一个月时间,吸毒贩毒者先后落网,警方还收缴了部分毒品和毒资。事后许俐得到了5000元奖金。这件事坚定了许俐与贩毒分子做斗争的信心。从此,她做起了职业“赏金猎人”。

当时,贩毒活动猖獗,反侦查能力越来越强,贩毒者对缉毒大队成员的身份特征几乎了如指掌。一个念头在许俐心中冒了出来,她主动

向警方请缨:“让我充当诱饵,乔装毒贩,引蛇出洞吧!”

2006年2月,警方通过内线“钓”上一个大毒贩,让许俐扮成一位女老板,不久,毒贩约她晚上到一个偏僻地方接头。在此之前,缉毒人员已经专门对她进行过“专业训练”,所以许俐在现场显得成竹在胸。验过样品后,双方以28万元谈成,但毒贩却提出先付10万元定金。许俐则以自己是外地人,不见货不敢交钱,怕被要为由推辞。对手也很狡猾,说货在别处,让她回去等电话通知。直到第三天中午,毒贩才忽然打来电话,说货已到本市,让她做好接货准备。双方商定,在本市一个繁华广场交易。毒贩要求在10分钟内赶到那里,并备好货款。

许俐迅速报告了缉毒大队。随后,她提着一个沉甸甸的包赶了过去。刚到约定地点,毒贩的小轿车也到了。毒贩打开车门,将装有毒品的挎包递给许俐手中,同时伸手要拿她的包。就在这一瞬间,埋伏在周围的缉毒刑警们一拥而上,将两名毒贩生擒活捉。这次行动中,许俐立了头功,缉毒大队根据事先约定,给了这位女“赏金猎人”1万元奖金。

在不方便警方出面或需要女性陪衬的行动中,许俐“客串”各种角色,协助办案。警方每一次成功“收网”后,都会根据所捉“鱼”的大小,给予她一些奖金。既能从中挣到钱,又可以为民除害,许俐深深爱上了这种充满挑战的生活。

## 知识型“猎人”大发正义财

儒雅的张鸣是一位知识型猎人,金融专业的他擅长为保险公司充当“福尔摩斯”,凭借专业本领和智慧,人行几年来赚到了百万赏金!因为对在司法部门工作的经历,张鸣经验丰富。与公安部门定额悬赏缉拿逃犯不同的是,保险公司一般按“猎人”挽回经济损失的20%—30%支付奖金。

2008年7月初,张鸣收到美国万通保险公司发来的一份传真,称美籍华人杨某投了一份人身意外死亡险,保险总额为60万美元。此人于6月2日在广东某市死亡,美方委托他在几日内核查清楚杨某的死因。

张鸣立即进行全面调查,很快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在事故现场,没有发现明显的刹车痕迹。

接着,他又了解到一桩怪事:在某工业园区一座大垃圾场拣废品的北方人郭力,醉酒后溺水而死,后来尸体竟不翼而飞!从照片看,郭力与杨某的长相有几分相似。出于职业敏感,张鸣意识到这可能是一起骗保案。后来他终于查明,在美国做小生意的杨某,从旧金山回到家乡后就和儿子商量,找一个与自己外貌相似的死者“诈保”。父子俩一直在搜寻无名尸,后来终于找到了溺水死亡的拾荒人王力。偷走尸体,他们给死者穿上杨某的名牌衣服,伪造一起车祸,从此杨某就躲了起来。

由于张鸣的努力,使美国万通保险公司成功防范了一起保险欺诈案,同时树立了“猎人”的良好形象。事后,他本人也拿到了数万美元的奖金。

不论是千里追寻通缉要犯的孤胆英雄刘剑涛,还是巧妙引诱毒贩入法网的许俐,以及为公司挽回巨大经济损失的张鸣,这些“赏金猎人”就存在于普通百姓之间,让那些有犯罪念头的人心生忌惮,从而维持了良好的社会秩序。

(因“赏金猎人”们至今仍战斗在第一线,文中隐去了他们的真实姓名及住址。)

吴迪 李刚 唐晓洁/文 摘编自《报林》